

王朝建:定陶地方抗日武装的奠基人

王朝建1939年参加革命,曾任杨得志领导的冀鲁豫支队五大队第二营营长,1940年受杨得志委派回家乡定陶发展地方抗日武装,不久即任定陶县大队首任大队长。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44年冬英年早逝。定陶区至今仍有许多地方在广为传颂他的革命事迹。

在家乡放手发展抗日武装

1939年,王朝建出生于定陶城西北十六里邓集乡大王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结婚后,跟随盛庄的岳父学习中医,没几年就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中医。他在行医时认识了本县陆湾村的王子杰,两人结为莫逆之交。后来,他因奸人所害身陷牢狱长达8年之久。

在狱中,王朝建结识了同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逐渐产生了革命理想。出狱后,他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升任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五大队二营营长。

1939年6月,冀鲁豫支队攻克定陶城时,王朝建协助杨得志在大王庄村策划作战部署4个小时。定陶县城被攻克后,王朝建又从监狱中救出被国民党逮捕关押的王子杰。王子杰出于感恩,参加了八路军,

担任王朝建的警卫员。

不久,革命意志不坚定的王子杰擅自脱离革命队伍,回家乡陆湾村一带拉起一支灰色武装,后队伍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定陶县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和拉拢下,王子杰先后任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兼保安十五旅旅长,多次对共产党及抗日群众扬起屠刀。

1940年10月,杨得志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委派王朝建回定陶县从事统战工作。

王朝建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毅然放弃了营长职务,回家乡“白手起家”。王子杰一看自己的恩公和“老长官”重回定陶,不得不收敛许多。再加上王朝建的积极争取,王子杰表面上也不得不做了一些对抗日有益的事情。与此同时,王朝建利用自己的旧关系和八路军的影响,在该县放手发展抗日革命武装,很快就发展了200多人。

成立县大队和抗日县政府的“功臣”

1941年初,中共鲁西南地委派共产党员、曹县李集区区长郭又新,到定陶筹备成立定陶县抗日民主行政办事处,为了便于

郭又新开展工作,地委安排在定陶人地两熟的王朝建做好协助。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当年1月底,定陶县抗日民主行政办事处在张圈村召开了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经上级批准,定陶县第一支由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县大队,在郭伯堂村宣告成立,王朝建任大队长,周明轩任教导员,大队辖两个中队,共有200余人。定陶县抗日民主行政办事处和县大队的成立,标志着定陶县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1941年夏,定陶县抗日民主行政办事处在乔楼至游集一带,建立了定陶县第四抗日区公所,因这一带靠近王子杰的老巢陆湾村,为便于开展工作,办事处决定让王朝建任名誉区长。

随着定陶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经鲁西南地委、专署批准,决定成立中共定陶县委工作委员会和定陶抗日县政府。1941年9月,在马集蔡西明的客店院内,中共定陶县工委和定陶抗日县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郭又新激动地说:“定陶抗日县政府的成立,王朝建功不可没!”

抱病同王子杰达成“大王庄协议”

1944年,王子杰的势力达到极盛时期,有4个团,号称有4000人,并有轻重机枪18挺,掷弹筒40个。这时候,驻定陶日伪军也加紧了对他的拉拢,他又同日伪军“眉来眼去”起来,半公开地做起日寇的“马

前卒”,经常随意捕杀有共产党嫌疑的人。

这段时间,王朝建眼见王子杰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便通过各种方式,对王子杰进行了多方劝导和挽救,但王子杰对他阳奉阴违,大耍“两面派”,因而收效甚微。

1944年冬,鲁西南军分区党委决定利用王朝建同王子杰的老关系,对王子杰作最后一次争取。这时,王朝建尽管身患风寒,卧床不起,但还是决定参加这一行动,并建议将这次争取和谈判地点定在他的老家大王庄。

在大王庄,我方同王子杰进行了会谈。双方在大王庄谈了半天,但王子杰态度顽固,双方始终谈不拢,无法达成协议。无奈之下,我方提出划分势力范围:定陶城西为解放区,城南城东为游击区,王庄不能进入;城东北王庄不得妨碍我军活动。慑于我军分区主力部队的威力,加上王朝建苦口婆心地劝说,王子杰当面接受,谈判就此结束。

大王庄谈判后不久,王朝建因为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大王庄。出殡那天,王子杰亲自带两捆棺材前来送葬,并在王朝建灵前不住地叩头。此后不久,王子杰没了王朝建这一顾虑,便同共产党和八路军彻底撕破了脸,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1945年春,鲁西南军分区在定陶、曹县、成武等多个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通过三打王子杰,终于俘获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土匪,并将之枪决。

新中国成立后,王朝建被评定为革命烈士。

通讯员 王贞勤



景
山

景山,亦名楚丘,在曹县城东北四十里,今名梁堌堆,属侯集镇,北与成武县边境之冉楼相邻。

景山记载于经传史籍甚多。《诗经·商颂》是歌颂殷先祖成汤、武丁的祭庙之乐,其《烈祖》云:“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又《殷武》有:“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陟彼景山,松柏丸丸”。其中景、景山即指商都之景山。《烈祖》之句,意为景山四周,皆大河也。《殷武》之句,意为上天命大君主商汤设立都城在夏禹创业的地方;商之王都整饬,为四方之极;登上景山,松柏高大且直立。《竹书纪年》记:“黑龟赤文成字,言夏桀无道,成汤遂当代之,梼杌次于邵山。”《史记·六国年表》序《国语·周语》亦有此记载。景与丕、邵同,皆为大义,可见商之兴与“天命”有关,故商汤有景毫之命”。夏禹时,景山称桑台,夏中后期为楚人所居,称楚丘。商代,商军将楚人迁至江淮间。周代,宋人占据,称武城。而楚人仍以楚丘为先人宗庙,来此祭祖。秦时称武城县,项羽为西楚霸王时,改称楚丘县。刘邦为汉王时,灭掉英布后,过此,改楚丘为成武县。东汉后县城北迁,丘称楚丘亭、楚丘。据《括地志》《史记》正义记载,隋代,楚丘属己氏县,乃改己氏县为楚丘县,楚丘在楚丘县城北三十里。明清两代,楚丘复称景山,设景山铺,景山里。

1979年,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市委党史研究院 供稿



晁盖变“晁盖”砍头入族谱

在中国古代名著《水浒传》里,晁盖是郓城县东溪村人,是宋江之前的梁山寨主,所以他不在后来的一百单八将之列。但是,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后人的心目中,晁盖的地位与作用都不容忽视。

现在,在郓城县城以南有一个叫晁庄的村子,他们的祖上是从城东的七里铺迁来的,而据说七里铺就是当年的东溪村。晁庄村有200多户人家姓晁,他们都说自己是晁盖的后代。

据传,晁盖本人心胸坦荡,待人诚恳,因此人缘非常好。在劫取“生辰纲”以后,晁姓人无法在东溪村居住,便集体迁到了郓城正南十里处隐居,后来定名为晁庄。晁盖为躲官兵追杀,带领一伙上了当地的棘梁山(又名司里山)。凭借着棘梁山的天险,晁盖干起了杀富济贫、惩处恶霸的善举,被当地老百姓视为救星。后来,他的队伍逐渐壮大,由于棘梁山地方狭小,不再适合安营扎寨,所以才换了梁山作为大本营。

如今,晁庄晁姓一族还藏有共32卷的《晁氏宗谱》,该族谱自宋代立谱,以后又经过数次续修。从宋代一世祖晁迪开始,《晁氏宗谱》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世世相承,代代相传。然而从这本名字挤得密密麻麻的族谱上,查遍宋代那一篇,却不见有晁盖的名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此,族中长者是这样解释的:宋时,晁姓一世祖晁迪为工部侍郎,祖上算是官宦人家。族里按照名门望族的习俗、祖规,给予子孙后代定的入谱标准是忠良良将,落草为寇的人当然是不能被接纳的。一旦有了不肖子孙,生时要将其逐出家

门,死后也不得入宗谱,就连生身父母也不能相认。

但是,晁盖虽为“山贼”,却也称得上一代豪杰,不入族谱,不但对晁盖不公平,对晁氏家族也是一大憾事。于是,祖人再三斟酌,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就将繁体字“蓋”字去掉上面的“头”换成“盍”字入谱,且字体比别人的小了三分之一,俗称之为“砍头入谱”。用意有二:一是晁盖乃落草为寇,砍掉草字头便是去掉了“草寇”之嫌。二是显示对“草寇”的惩罚,也是对后人的警示。此外,虽然名字被“砍头入谱”了,但是字体要小,还要在谱书中将其单独列出,上不连父母,旁不连兄弟,意思是划清界限,所以显得孤苦伶仃。

这就是晁氏族谱中为什么把“晁盖”写成“晁盍”的原因。

晁盖虽在宗谱上被“砍了头”,但在本村及郓城周围十里八乡却是完美高大的形象。直到今天,乡亲们还在用淳朴的民歌赞扬着他:聚义厅,净英雄,晁盖他是第一名;打贪官,反朝廷,分衣分粮救贫穷。

这些歌谣流传数百年,充分体现了故乡人民对农民起义领袖晁盖的敬仰之情。

魏建国



位卑松在涧

——王禹偁在成武的宦途岁月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说他:“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苏轼说:“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这个让欧阳修和苏轼夸赞的人就是宋代济州钜野人(今巨野县)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北宋名臣、白体诗人、散文家,因曾被贬黄州,又被称为“王黄州”。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他是北宋第一位载入文学史的诗人和文学家。而

成武县,作为王禹偁宦海生涯的起点,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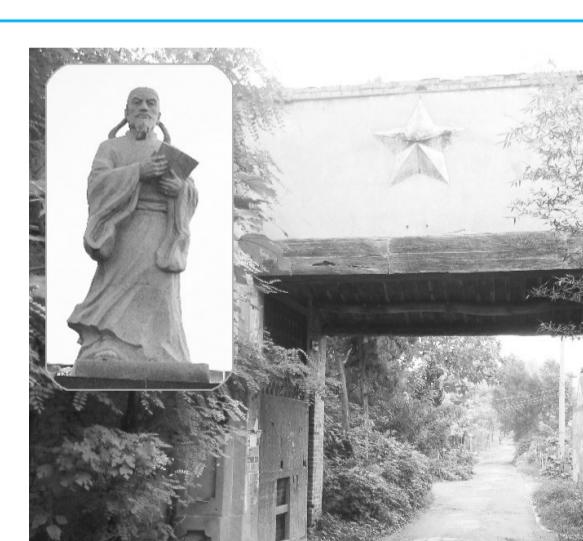
王禹偁九岁能文,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科举考试中,王禹偁以省试第一名的身份获得了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的资格,在殿试中,中乙科进士。这年七月,被派到了和其家乡相邻的成武县担任了九品的主簿职务,主簿主要是协助知县处理政务。在成武县,初涉宦海的王禹偁感到

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这从他的《官成武主簿作五首》诗中就可以看出来。“释褐来成武,始知为政难。每签逃户状,羞作主人官。……宦情销已矣,时梦钓鱼滩。”本想有一番作为的王禹偁,到任后面对的则是县内民生的凋敝和穷困,以及不少家庭举家逃难的现实,这让他感到非常无奈,在诗中,他还描写了自己“惠民无政术,尸禄竟如何”的自责心理以及“位卑松在涧”的生活窘迫。

于是,王禹偁把自己封闭起来,除了吃早饭,十多天不与人说话。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王禹偁在逆境中成长,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积极配合县令崔惟宁处理政事。据《城武县志》载:“(王禹偁)初莅事,察一二舞文吏挞而去之。自是,人莫敢犯,夙弊顿革。”在革除旧弊的同时,王禹偁在成武还“兴学校,劝农桑,平赋役,恤困穷,民有争讼,悉切晓谕。”使成武县“政平如

人和,刑清讼简,境内以治。”而王禹偁也对这作了记述,在《答丁谓书》中说:“吾为主簿一年,奔走事县令。”《单州成武县主簿厅记》说:“到任之明年,属岁丰政简。”这充分证明了他出色的为政能力和治政才华。

最重要的是,王禹偁在成武县留下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一篇是《单州成武县主簿厅记》。在这篇文章里,王禹偁对主簿的位卑而责重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说明,强调虽然主簿“为卑冗之魁者”,但“士君子学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贵贱,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表达了他自己做官的目的,就是“行乎道、利乎民”,王禹偁把这篇文章写在了主簿厅的墙上,同时告诫后来者,不能因为主簿官小就自暴自弃,而“自败其道”。文中还对主簿的个人品质作了要求,平时要“公于心而执乎道”,这样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做官的价值。这样,不以自己的官小而感到没有大的用处,而要时刻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从而积极工作,作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事。能够做到这样,也就不会感到自己的卑小了,自己的忙碌也就有了更大的意义,“又何卑冗之有呢?”也给人以振奋自信之感。同时,它也显示了王禹偁非常老道的文章功力,因而被当时的人们广泛传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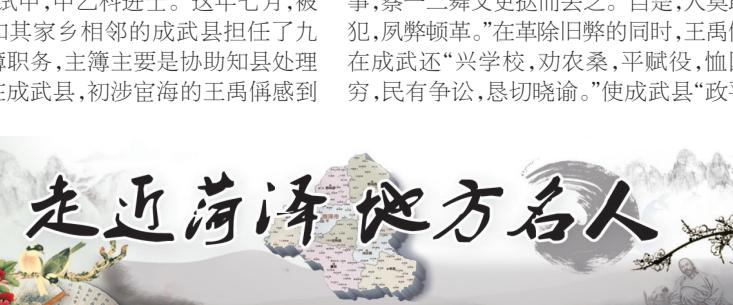


王禹偁雕像及宋代成武县衙遗址

从成武县起步,王禹偁开始了他长达十八年的宦海沉浮。

宋咸平四年(1001年)五月十七日,王禹偁在蕲州刺史任上病逝。真宗闻讣甚嗟悼之,厚葬王禹偁于巨野龙泉寺东酒庄(今属嘉祥县),立墓碑,建鸟头门,旌表天下。同年进士戚纶在哀悼他的文章中说“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已有,疾恶过仇雠。”世以为知言。

成武县是王禹偁官场生涯的第一站,可以说,这里的一切给了以后王禹偁积极用世的为政思想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为他以后成为一代名臣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他一生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这位大文学家的到来,也给成武的千年历史留下了心香一瓣。文/图 张长国



丰 嘉 鸿